

古
代
中
国

中国古代谚语

王树山 主编

谚
语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谚语

王树山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谚语

王树山 主编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7.75 字数:70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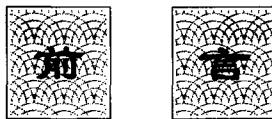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5440-1611-0

G·1534 定价:38.00 元



如何认定谚语？如何分辨谚语的精华与糟粕？如何看待谚语和雅言的相互关系？这三者，是谚语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本书必须首先向读者作交代的要点。在《中国古代谚语》正式与读者见面之时，特撰“前言”，就此三者发表意见，敬求读者批评指正。

—

什么是谚语？

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谚，传言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释：“谚者，直语也。”旧版《辞海》释：“俗言曰谚。”新版《辞源》释：“长期流传下来文词固定的常言。”

说谚语是“传言”，这是含混不清的。因为，古圣先贤的格言是传言，经史典籍的警句是传言，谚语也可以说是传言。把格言、警句、谚语包容在一起，这使谚语的界定十分模糊。说谚语是“直语”，也很不确切。因为，直语是不加修饰、不加润色的词语，历来多少文人下笔重在朴直，但那朴直的词语绝不能算作谚语。说谚语是“俗言”，这也不尽然。因为，谚语固然是俗言，可歇后语、惯用语、时语，甚至一些文辞通俗的语句，又何尝不都是俗言呢？说谚语是“长期流传下来文词固定的常言”，这比起前三种说法固然要全面些，正确些，但也只是侧重于谚语的形式方面，没有论及谚语内在的义理。由此可以这么说，前人对谚语的解释，未免失之于笼统与简略。

谚语是精炼而活泼的群众口头语；它表达的是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它是群众生活、生产的经验总结；它蕴藏着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深刻哲理。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官升虎气减”，是说官位越高升，顾虑就越多，做事情原先那种虎虎生风就越少。这是群众口头语，而又十分精炼活泼。一句谚语只五个字，表述了极

深厚的思想内涵，语言的凝炼，几乎到了无一字可易、无一字可减的程度。可见只说“口语”还不够，必须是“精炼而活泼的口语”才是谚语的语言特色。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未穷先穷不穷，未富先富不富”，“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针”，“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不是只从一个方面，而是多方面、多角度地表达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是谚语在内容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是说为一年作规划，关键在春天；为一天作安排，关键在早晨。“荷锄候雨，不如决渚”，是说消极等待，不如积极行动。“猪圈长肉，人圈卖屋”，是说人如果懒得像猪一样吃了睡，睡了吃，那会穷到连住房也要卖光的地步。总结群众生产与生活的经验，用以推动生产，指点生活，这是谚语存在并发展的生命线。

最能显示出谚语特性的，是它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其中的哲理；而这种揭示，往往新颖而精辟，发人深思。比如：“十日滩头坐，一日过九洲”，原指航行遇着逆风，只好坐在滩头等；顺风一来，一日之间就可赶上十天的航程。这当然只是现象，它指点的深层意思是：做事要善于等待时机，利用时机，而不能盲动硬拼。再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原指鹬鸟用它的长嘴啄蚌壳里的肉，蚌用硬壳夹住它的长嘴，两不相让，结果被打鱼老翁一齐捉了去。这条谚语提醒人们：双方赌气不肯让步，只会给第三者留下从中取利的机会。

综上所述，风格上的口语化，表意上的群众化，内容上的知识化，认识上的哲理化——这四化，是构成谚语的基本条件。

谚语是群众创造的，在群众中流传，又在流传中发展壮大，由此它是健康的，正确的，是源远流长的。

但是，谚语并非是在真空里生出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谚语。也就是说，每一个历史阶段所产生的谚语，总不免要打上这一历史阶段所特有的时代印记。这就造成了谚语在内容上的复杂性，有时精华与糟粕共存，进步与落后相混，并非全是清一色的健康与正确。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一直是受压迫、受伤害的。谚语对此一面提出血的控诉，一面又接受封建礼教的训条，向苦难中的妇女注入礼教毒素。例如：“小脚一双泪一缸”，“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嫁个孤堆坐着守”，“娶到的妻，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作为现时代的读者，你是同情也好，可怜也好，为旧时的妇女那种悲惨命运义愤填膺也好，但这里所列的谚语，只是供你认识旧时代妇女的遭遇的，绝非教你去照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标准做新时代的旧型妇女。所以说，这些古代谚语的入书，不是出于引导今人“照样做”的目的，而是揭开历史的面纱，让今人认识过去了的岁月，知道今天的开放，来自以往的禁锢，今天的幸福，来自以往的苦难。

古代谚语中不乏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珍品，这是谚语中的精髓，即使一万年之后，也仍然焕发着民族传统精神的熠熠之光，不会被磨灭的。例如：说人的品德声望在行不在言，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利于行为的善言往往逆耳，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挥霍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有“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说培养人才是长久之计，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面对流言蜚语惟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自身修养，有“止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像这类谚语，你把它当指路明灯去追求，可以；你把它当生活中的座右铭去恪守，也可以。

但精髓终归是精髓，它不是事物的全部。古代谚语脱不开旧时代的制约，在它表现出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夹带些旧思想、旧意识。

我们今天提倡热爱祖国，这祖国是人民的；但在古代，忠于国家却总是和忠于君王粘连在一起，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我们今天提倡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但在古代，当官总是和发财粘连在一起，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官久自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今天提倡维护治安，见义勇为，但古代谚语中却有这一类词目：“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闲事莫管，闲话少说”，“捉贼不如放贼”，“出头的椽子先朽烂”。

既然古代谚语中有如此多的落后、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观点，何不在词目的释义中加以批判？这不可以，因为辞书不是评传，只允许用“旧指”、“指旧时”等字眼提醒读者，却不能直接点评与批判。

二

谚语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发展的？

先从四、五千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夏朝的末代君王夏桀，暴虐无道，人民苦不堪言，对这个暴君恨之入骨。当时在群众中造出了这样一条时谚：“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头顶上这毒太阳什么时候才毁灭呢？只要你毁灭，我们老百姓甘愿和你一道丧命！（见《尚书·汤誓》）这大约就是我国最早的一条有史可稽的时谚了。它的产生，是与千万劳动人民生命相关连，是被压迫群众反抗的怒吼。由此可见，谚语是从人民群众中产生，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开去的。

自从有了民族的语言，也就有了谚语，因为谚语是人民群众口头语的结晶。按理说，自从有了文字，也就有了对谚语的记录。但在先秦时期，文字垄断在统治阶级手里，平民百姓无权使用，所以那时流传着的谚语再多，劳苦群众无法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世，谚语也就只好任其自生自灭了。我们现在能从先秦典籍中见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谚语，那大都是经过上层文人加工润色的，带着雅的书卷气息，减弱了它原有的粗犷活泼的韵味。现举以下例句来说明：“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见《左传·隐公十一年》引周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见《孟子·梁惠王下》引夏谚）“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见《韩非子·六反》引古谚）以上诸例句，很少有社会下层鄙俚的气味，然而却都明明冠着谚语的标识。

再举明、清小说戏曲中的例句来作比较：“十日卖不得一担真，一日倒卖三担假。”（见明代小说《金瓶梅》）“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见明代小说《西游记》）“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见清代小说《红楼梦》）“贼咬一口，烂见骨头。”（见清代小说《活地狱》）“骏马每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见明代戏曲《西楼记》）

把先秦典籍中的谚语和明、清小说戏曲中的谚语作比较，就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来：前者取材于社会上层，后者取材于群众生活；前者书卷气浓，后者口语性强。可以说，谚语自从进入小说戏曲，才真正表现出它那“俗”的面目来。

本来，雅言就是雅言，谚语就是谚语，一雅一俗，大相径庭。凡雅言，都有具体的作者。举例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孔子的话，见《论语·述而》。“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是荀况的话，见《荀子·劝学篇》。凡谚语，原则上是群众口头话，没有具体作者。举例说，“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但那是《史记》中引用的谚语，并非作者自己的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见清代小说《黄绣球》一回，但那也只是书中引用的俗谚，并非作者自己的话。

判定谚语，最忌臆断。一般来说，谚语词目前加的标识，是人们认识谚语的根据。秦汉前后多用“谚”、“俗谚”、“鄙谚”、“时谚”、“古谚”、“俚语”、“野语”、“鄙语”、“民语”等作标识；宋、元以后多用“常言道”、“人常说”、“自古道”、“从来说”、“俗话说”等作标识。例如：△《列子·说符》：“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韩非子·说林下》：“鄙谚所谓‘虏自卖裘而不售，士自誉辩而不信’。”△汉·牟融《牟子》卷一：“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駝言马肿背’。”△汉·刘安《淮南子·说山训》：“里谚曰：‘烹牛而不盐，败所为也’。”△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篇》：“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庄子·外篇·秋水》：“野语有之：‘闻道百，以为莫已若’。”△《荀子·大略篇》：“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汉·应劭《风俗通义·正失》：“俚语：‘狐欲渡河，无奈尾何’。”△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俗云：‘书无百日工’。”△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五：“鄙语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东周列国志》八回：“自古道：‘聚人易，散人难’。”△《隋唐演义》一〇回：“常言道：‘同行无疏伴’。”△《拍案惊奇》卷三二：“从来说：‘老蚌出明珠’。”△《醒世姻缘传》七〇回：“人常说：‘妻贤夫祸少’。”△《何典》二回：“老话头：‘不怕官，只怕管’。”

在谚语词目前加标识，这是前人对谚语的认可，我们根据这些标识去认定谚语，大体不会错。但凡事不能绝对，也有加上标识的，词目并非谚语，像明·梅鼎祚《玉合记》二出中把“南风不竞”也冠以“常言道”作为谚语，便是很典型的一例。

与此同时，有些很地道的谚语，词目前却未加标识。作者有时为了加大语言效果，直接把谚语揉合在行文中，比如《何典》一〇回：“他看得大树底下好遮荫，便坐下少憩。”这里的“大树底下好遮荫”，是很地道的一条谚语，但却没有标识。这种情况是常见的。

加标识的，偶尔也有冒牌谚语；不加标识的，却往往有不少是地道的谚语。要把加标识的冒牌谚语清洗掉，把未加标识的地道谚语选进来，这是颇费力气

的事，然而又是研究谚语的重要课题。

三

雅言能化为谚语吗？

我们说谚语是群众口头语的结晶，是说群众口头语是创造谚语的主要渠道，但不是惟一渠道；创造谚语是多渠道的。

谚语是俗的，格言、诗句是雅的，二者有分明的界限。但俗能变雅，雅也能化俗。这变化，当然是有条件的，绝不是随意说变就能变的。

先谈格言如何能变谚语。

在先秦经史子集中，有不少格言，后来却变成众所公认的谚语。格言变谚语，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直接引进。一些格言，由于它本身包含着群众的意愿，具有群众口头语的特点，为群众所喜闻乐道，于是众口流传，终于给它冠上谚语的标识，年长月久，约定俗成，也就变成正牌谚语了。这类例子很多，仅从《周易》、《论语》中就可举出一大串：

《易·乾》：“云从龙，风从虎。”△《三宝太监西洋记》五六回：“自古道：‘云从龙，风从虎’。”

《易·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明·梁辰鱼《浣纱记》四三出：“自古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明·龙子犹《双雄记》九折：“自古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罗广斌等《红岩》一三：“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金瓶梅》八五回：“常言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明·高明《琵琶记》三九出：“自古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二、加工改造。谚语和格言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在于谚语的口语化。有些格言，多方面都近似谚语，却往往由于这一原因，进入不了谚语的行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原句进行加工改造，或增益其成分使之丰满，或芟除其枝叶使之净化。这样或增或减之后，使它脱去书面语的气质，变化为谚语。请看下面例证：

《尚书·盘庚》：“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清·翟灏《通俗编·服饰》：“俚语曰：‘衣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

《孙子·谋攻》：“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三侠五义》六〇回：“俗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管子·君臣下》：“墙有耳，伏寇在侧。”△《金瓶梅》五五回：“人言：‘墙有风，壁有耳’。”△《水浒全传》一六回：“常言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三、语有所本。另有一种情况，既不是“直接引进”，也不是“加工改造”，而是以原话句为根据，另行造出面目一新的谚语来。这一类由格言变化来的谚语，不大受原话句的约束，比较自由方便，和前两类相比，数量更为丰富。请看下列各例句：

《诗经·小雅·小旻》：“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后汉书·曹褒传》：“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

《易·未济》：“小狐汔济，濡其尾。”△汉·应劭《风俗通义·正失》：“俚语：‘狐欲渡河，无奈尾何’。”

《论语·颜渊》：“驷不及舌。”△《醒世恒言》卷五：“自古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左传·隐公六年》：“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元·张国宾《合汗衫》三折：“常言道：‘剪草除根，萌芽不发’。”△《醒世恒言》卷三六：“常言说得好：‘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发’。”△《金瓶梅》二五回：“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旧生；剪草若除根，萌芽不再生’。”

再谈诗句如何能变谚语。

在谚语的群体里，有的词目是直接由诗句转变来的，一字不增，一字不减。请看下面各例：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君子行》：“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清·褚人获

《坚瓠集·十集》卷四：“今人谚语多古人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魏·应璩《三叟诗》：“晚饭少吃过，活到九十九。”△钱钟书《谈艺录》七六：“俗语出诗句：‘晚饭少吃过，活到九十九’。”

唐·杜甫《前出塞》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三宝太监西洋记》八〇回：“自古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射法篇》：“谚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唐·鱼玄机《寄邻女》诗：“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清·钱大昕《恒言录》卷六：“俗谚有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以上各例，是诗中的名句，同时又是被公众认可的谚语。大体说来，要使诗句变成谚语，必须具有三方面的前提条件：

首先，这些诗句必须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谚语的特性，即：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倾诉人民群众的心声。

其次，这些诗句必须在表达形式上具有谚语的特点，即：形象生动，夸张妙喻，语直而不浅露，意长而不玄奥，风趣活泼，口语性强。换句话说，通俗、上口、比喻、夸张、形象、风趣，是谚语在表达形式上的“六要素”。这六大要素，是诗句能否进入谚语行列的一道检验严格的关口，丝毫也通融不得。

再次，诗句变谚语，还取决于诗人创作的路线与风格。有的诗人，诗作的造诣很高，如唐代王维的诗，意境高雅，可以写出流传千古的绝妙诗句，但绝不是谚语。再如唐代李白的诗，豪放奔腾，可以写出气吞山河的豪言秀句，但也绝不是谚语。而像白居易、杜荀鹤、罗隐、王梵志、范石湖等唐、宋诗人，他们在诗风上力求通俗，直接采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吸收大量的俗词土语入诗，自然就容易写出与谚语同格调的诗句来。

以上所谈三方面，在用来衡量诗句是否能成为谚语的时候，必须三位一体，而不能孤立地以一个条件作标尺。诗句转化为谚语，是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谚语化的。

王树山

1998年3月30日

“二古” 双璧 雅俗共赏

—《中国古代格言》、《中国古代谚语》总序

·景克宇·

《中国古代格言》和《中国古代谚语》，合称“二古”。两书各近百万字，词目各近万条，相对成书，联袂出版。“二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堪称中国语言文化的双璧，一雅一俗，双璧合成，组成了中国古代格言及谚语的姊妹篇，是为雅俗共赏的巨制。

“二古”主编王树山先生，埋首书山语海，春秋廿载，精研俗语学，兼及名言格言学，编著等身，是卓然成家的语言学者，以严谨的学风享誉学界。“二古”的成书，是他继《中国名言大观》（主编，198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外国名言大观》（主编，1992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俗语大辞典》（副主编，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古今俗语集成》（副主编，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经济谚语》（专著，1994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汉语常用语词典》（副主编，1996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华谚海》（主编之一，1997年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俗语中的动物形象》（专著，1995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学生馈赠格言》（专著，1991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历代名家养生精要》（专著，1992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等编著之后，伏案五载，宵衣旰食，胸罗万卷，精选佳构的新贡献。

格言，贵在有格；谚语，贵在成谚。格言如果无格，那就会把它和名言、妙语混为一谈，失去格言的品位；谚语如果不谚，那就会把它和古圣先贤的传言哲语掺杂一处，失去谚语的本色。这种混杂的结果，必然造成格言、谚语的名实不称，悖离正体，无疑在语格界定方面铸成不小的失错。因而，格言必求有格，谚语务期成谚，正本清源，以便给广大读者提供界定分明的古代格言与古代谚语，就成为编撰这“二古”的一个重要宗旨；而同时，也正以此显示出这“二古”的一大特色。

然则，格言与谚语的界定标尺是什么呢？

格言的界定：《说文解字》释格为“木长貌”。《说文解字段注》释：“木长者，格之本义。引申之，长必有所至，故释诂曰：格，至也。”标定了格言语格的规范性。旧版《辞海》释：“言之可以为人法则者，曰格言。”规定了格言语义的法式性。《辞源》释：“含有教育意

义可作为准则的话。”标示了格言内涵的导向性。

据此，“二古”所收格言条目，遵循学科的界定，以“三性”为标尺，即：坚持语格上的规范性，表意上的法式性，思想上的哲理性；三性缺一，宁舍不收，从而廓清了格言与名言、警辞、佳句、妙语的界限。

谚语的界定：谚的古诂，《说文解字》释：“谚，传言也，从言，彦声。”是为谚的音义。据段玉裁注载玄应引古注，谚是“传世常言”之意，是为谚的文本义。《文心雕龙》释：“谚者，直语也”，为“廛路浅言”。音义文相合，道明了谚语传言的民间性，表意的通俗性，语格的沿袭性。

据此，“二古”所收谚语条目，遵循古训的界定，坚持语前必有标识，即明示有“谚”、“俚语”、“鄙语”、“野语”、“俗话说”、“常言道”、“人常说”等，做到条条有根据，句句不臆断，从而廓清了谚语与一般传言雅语混杂不清的界限。

因是，读者所看到的“二古”成书，是具有严格学术界说的古代格言和古代谚语的精选真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体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工程，是建筑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要从总体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则必须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瀚，广森无际，令人望洋兴叹。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就必须善于从恢宏的民族文化中筛选和整理具有根本意义的优秀遗产，古为今用。“二古”之选释，恰是应了时代的需要。

“二古”资料来源，上溯先秦，下至明清，以《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古小说丛刊》等大套书为基本，旁及单行出版的子集、史书、笔记、小说、戏曲等。选编者读书万余种，过手百万卷，摘录十万卡，精选入书词目“二古”各近万条，条条作出诠释。孜孜矻矻，千淘万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披沙拣金，遂成巨构。

语言是民族文化活跃的载体，是民族文明流动的建筑。显示民族风貌并能守护民族荣誉的，莫过于民族语言；语言，是民族精神文明。

汉语言文字是我们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母语，其字形的艺术结构，音序的多姿变异，深渺的形意内蕴，丰美的表述方式，是瑰奇的文化创造，在世界语林中独树一帜。这特别表现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古语的神韵以及传道民间谚语的谐趣，组成了中华民族语言的两极。历代典籍中语言的绝响，经历群哲先贤的洗炼，几度秦关汉阙，唐诗宋韵，元风清雨，古哲格言已被陶冶到出神入化的胜境；而民间世代相传的口谚，融汇了万民的聪慧，历经传讲打磨，已把俗化的“廛路浅言”锤炼到形神兼备的程度。格言与谚语同步殊异，并列为中华母语的两极，共同建构起民族文化璀璨夺目的华表。

语言是思想观念的伟大载体，承载着和积淀着历史的、社会的、自然的、人生的斗争、经验、觉悟、认识，负荷着民族的思维和情愫，并相应推动着人脑的发育和进化，联接着世代民族文化的纽带。语言可挟带的巨大的思想观念以及万众生民的呼声，极大地作用于历史的磅礴进程，产生着推波助澜的影响。如果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活的历史，那么中国古代格言和古代谚语，则应是中国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的折射，构成了传统优秀文化的档案。这是因为“二古”蕴涵着先贤大哲的思辨和先民百姓的广识，闪烁着哲理之光，跳动着万众之心。这笔千古遗产，从历史深处延伸而来，弘扬着我们的精神财富，展现着民族文化的指纹。

分别观之，古代格言凝聚着我们历代古圣先贤立身处世、伦理道德、治学创业、报国守成、运筹韬略、济世经邦的精辟思想；包容着成败兴替的明断，生命深邃的参悟，忧国忧民的铭记，春秋褒贬的警策。一部古代格言，可谓是先师思想的化石，构成了古代群贤思想谱系的坐标，予今人以启迪、规范、激励、陶冶和引导。总之，古代格言犹似镶嵌着绝妙思想的琥珀，包容着民族文化之根，其思辨的原则性，题旨的永恒性，内涵的深广性，思维的睿智性，显示出民族宝典的神韵，辐射着恒久的生命力，孕育着延伸优秀文化的基因。把这些文化基因和当代文化结合起来，就能培养出既有民族特色，又响彻时代精神的文化，增强人民的精神素质，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我想，古代格言的面世，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庶几在此。

古代谚语是古代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深含着百姓大众对各自生活时代刻骨铭心的体察，对社会观感的是非善恶、褒贬抑扬、希冀企求、求生之道尽在其中，自然深烙着历史的印迹，标志着一定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同时由于谚语直接源于民间日常生活，交织着百姓的共识和认同，带有广泛的流传性，质朴通俗的口语性，反映了民风、民声、民情、民心，也就自然表现出古谚的人民性。因此，古谚无疑是民族文化的庞大财富，是民族良知的精华。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古谚，古谚里有中国心。要了解民族文化，就要了解古谚，古谚里有人民文化的厚重积淀。我想，古代谚语的编撰，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庶几在此。

这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二古”同步选编、联袂出版的饶有意味的结构。古格言和古谚语，无疑是一对矛盾：古格言是阳春白雪，古谚语则是下里巴人。一个是大雅，一个则大俗。编者独具匠心，别出心裁地把大雅的古格言和大俗的古谚语结为姊妹，合成双璧，互为映衬，这题中之义是颇堪寻味的。

古格言的大雅，在于它的思辨性，出自贤哲的哲理思考，是智慧的升华。古谚语的大俗，在于它的实践性，植根直接的生活现实，是生态的总结。妙语生春、字字珠玑的大哲先贤，恰似名山之仙，水中之龙，毕竟是少数，是精粹的。家常俚言、喜闻乐道的万民百姓，却是城乡俚野土生土长的芸芸众生，自然为数众多，是博大的。如果说古格言是思辨的高

峰，那么，古谚语则是生活的大地。思辨的高峰放射着哲理的真知灼见，生活的大地负载着生息的万民之心。人们在古格言中登凌智慧的绝顶，领略思辨高峰的无限风光，可以开阔思路，放大视野，从而思接千载，启发人们深思。人们在古谚语中立足生活的大地，倾听大地生民的生命呼声，可以面对历史，洞察古今，从而视通万里，引导人们警世。

如此说来，古格言的精英文化与古谚语的大众文化，两者结合，互补阙如，俗以显雅，化雅为俗，互映生辉，岂非相得益彰。我想，“二古”同步编撰，其匠心独运的深意，庶几在此。这又使我联想到，如何让高文化走向民间，又如何让俗文化品位升华，从而达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统一，这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课题。那么，“二古”之编，其构思的巧设，无疑对此作出了有益的探求。

概而言之，古格言以其睿智的内涵和凝练的形式，具有不朽的永恒性。古谚语以其丰满的感情和活泼的语态，具有浓郁的生活性。雅俗交接，涵天覆地，气象万千。是以“二古”之成，实为书界作出了正本清源、拾遗补阙的大贡献。

古人有云：“赠人以轩，不如赠人以言。”“二古”双璧，雅俗共赏。一卷在手，目逆神驰；两卷对照，会意无穷。那么，面对大雅大俗之作，领略古代雅俗语言的精髓，是会如同一位西哲所言那样“怀着期望打开，带着收益合上”的。

是为序。

凡 例

- ▲ 《中国古代格言》与《中国古代谚语》，合称“二古”，为姊妹篇，联袂出版；本书是“二古”之一——《中国古代谚语》。
- ▲ 谚语贵在成谚。本书所选谚语词目，凡正条，词目前一律带有标识，即词目之前必须冠有“谚”、“古谚”、“俗谚”、“鄙语”、“野语”、“俚语”、“人常说”、“常言说”、“自古道”等，换言之：每一条目都必然是经由古代书证所认可，否则宁舍不收。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要排除谚语选条上的主观臆断，以保持谚语的本色，不使其他语种掺杂其间。
- ▲ 本书出条形式，分正条与副条。凡意义独立的词目，列为正条。正条下详加诠释，然后援引书证；凡与正条相近或基本相同者，作副条，词目前加“※”标识，附于正条之后，只标出处，不作诠释。
- ▲ 本书资料来源，上起先秦典籍，下迄清代末期，“二古”双管齐下，谚语、格言并录，以《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古小说丛刊》等大套书为基本，旁及单行出版的子集、史书、笔记、小说、戏曲等。读书万余种，过手百万卷，选录词目十余万条，然后精挑细选，方才入书。本书入选谚语，与它的姊妹篇《中国古代格言》相上下，近万条。
- ▲ 本书因涉及图书资料繁多，出条格式，难以详分，大体规划如下：先秦典籍、历代正史，均出书名、篇名；先秦以下子集、戏曲、笔记、诗文专著等，出朝代、作者、书名、篇名或卷次；小说出书名、章回；总集出朝代、作者、篇名；类书除出类书名、卷次外，并出所引书名。
- ▲ 行文中凡正条的词目，一律用“~”符号代替。凡行文与正条词目在字面上有出入者，则用文字记述，不使用符号。至于副条，则一律使用文字记述。
- ▲ 本书在诠释方面，力求简明透彻。在一般情况下，分为三个步骤：一、给生字注音，给难词解释；二、解说词条的字面意思；三、揭示词条的深层涵义。
- ▲ 全书的编排，卷中设篇。一篇之中，不论词目多少，一律以正条的首字笔画繁简为序，笔画简的在前，繁的在后。首字笔画相同的，则以一横、二竖、三撇、四点、五折勾为次序排列。首字相同的，以第二字笔画繁简为序；以此类推。
- ▲ 谚语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不像格言那样每句话都有具体作者。因

此，本书所出谚语词目，只标明它所出现的书卷的语言环境，而不考证它有没有原始出处。例如：[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这一词目，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射法篇》中标为“谚”，即以此为根据出条，不考证它原出于唐·杜甫《前出塞》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 ▲ 谚语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它在充分表现劳动人民的意愿、总结生产斗争的经验之中，必不可免地也要带着一些封建糟粕性的东西，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时，汲取精华，剔除糟粕。
- ▲ 本书正文后设全书词目笔画索引，仍以词目首字笔画先简后繁为序，检法可参考本凡例第八条。索引中的词目，不分正条副条，一律在全书词目索引中出现。